



第三章

中國第一個總統

一九一——一九一二年

TIEG20



孫中山傳

宋文翰題

一、四川保路運動

孫中山領導的武裝起義雖然連續遭到失敗，但是在孫中山領導各次武裝起義的同時，各地勞動群眾由於不堪清朝政府的剝削和壓迫，自發地進行反抗鬥爭和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革命形勢繼續高漲。

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〇年這一時期，長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蘇等省的許多州縣，先後發生饑民暴動。據不完全統計，大小共九十多起，影響較大的是一九一〇年長沙的「搶米」風潮。湖南在前一年曾遭到水澇乾旱，糧食歉收。但官紳富商以及外國洋行卻乘機囤積居奇，哄抬糧價，以致米價由往年每升二十文左右飛漲到八十多文。這種被內外反動派擴大的饑荒威脅，使得長沙市城郊的勞動人民以及外地流入的災民，無法繼續生活下去。四月初，成千上萬饑民聚集起來，把全市一百多家米店的糧食通通搶光，放火燒毀了清朝巡撫衙門、帝國主義的教堂和洋行等。長沙以外的許多州縣也相繼發生搶米風潮。這一行動震動了全國。

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〇年，全國各省普遍發生了反抗捐稅的群眾運動，「官逼民反」、「紳逼民變」的情況到處皆是，其中以一九一〇年山東萊陽的抗捐鬥爭規模最大。五六萬起義群眾在聯莊會首領、塾師曲詩文的領導下，組織武裝，四處捉拿一貫橫行鄉里、強征暴斂的土豪劣紳。這個反抗的怒火，很快就延燒到附近的幾個縣。

當時，革命黨人雖然沒有自覺地去領導這些群眾反抗鬥爭，但這種遍及全國城鄉各地的人民反抗鬥爭，與孫中山領導的武裝起義在客觀上相互配合，彼此呼應，鬥爭烈火，燃燒不息，形成了迅猛發展的革命形勢，把清朝皇帝的寶座推向火山口上。

武裝起義不僅動搖了清朝政府的反動統治，也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群眾。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在歷次起義鬥爭中英勇奮戰和敢於犧牲的精神，博得了人民的敬仰和信賴，進



一九一一年八月清政府派端方為鐵路大臣到四川查辦保路風潮，端方奏調湖北部分新軍入川，致使湖北地區清軍兵力減弱。圖為端方及其幕僚合影。

一步激發了人民群眾的革命情緒。當時陝西民間盛傳這樣的歌謠：「不用掐，不用算，宣統不過二年半。今年豬吃羊，¹明年種田不納糧。」這說明人民要求推翻封建剝削制度的願望，和對革命的勝利抱著無限的信心。可以看出，一個全國性規模的革命風暴已經到來了。

在二十世紀初年以後，為了對付日益高漲的革命洪流，清政府使用了反革命的兩種手段：一面極力加強專制統治，增練新軍，更加殘暴地鎮壓人民；一面導演「預備立憲」醜劇，欺騙人民，抵制革命。但這種假立憲沒有騙了人民群眾，卻使資產階級改良派歡欣若狂。以江蘇大資本家張謇為代表的各省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和地方官紳，相繼糾合，組成「預備立憲公會」等社團，一再向清政府請願，要求早日賜予憲政。遠在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更喜出望外，把保皇會改稱為國民憲政會，同國內的立憲社團一唱一合。他們反對革命，主張君主立憲，因此被人們稱為立憲派。儘管立憲派再三發起請願活動，叩頭乞求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但清政府卻不肯交出絲毫的權力。一九二一年五月，清王朝組成了「皇族內閣」，將所有軍政大權集中在皇室和貴族手中，所謂「立憲」完全是騙局。立憲派這才發現自己受騙和被愚弄，因而對清政府也產生了憤懣的情緒。

當中國社會內部的各種矛盾已經積累到一觸即發的地步，只要有一個引發，大雪崩很快就會開始。四川保路運動，便成為這場大革命到來的導火線。

1 一九二一年（清宣統三年）是舊曆辛亥年。按舊說，亥屬豬。羊是洋的諧音。「今年豬吃羊」，意思是辛亥年驅逐外國殖民者。

日暮途窮的清朝政府，越來越腐朽無恥。統治者大量出賣礦山和鐵路的主權，以換取外國主子的歡心和支持。各地人民堅決反對這種賣國行為，紛紛要求收回權利。直隸省人民爭回了開灤煤礦，山東省和雲南省的人民也爭回了本省的礦權。湖南、湖北、江蘇、浙江、安徽、山西、河南和四川等省都爭回和保住了一些鐵路和礦山的權利。這場收回路礦運動是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為內容、具有相當群眾規模的愛國運動。參加這個運動的社會階層是比較廣泛的。運動雖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的效果，但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勝利。這大大激發了人們的愛國熱情，使人們逐漸認識到：要救國，不能一味信賴政府，還要靠群眾自己起來抵抗。這可以說是四川保路運動的前奏。

粵漢、川漢兩條鐵路，清朝政府本來已答應由政府監督、人民自辦，並且從人民身上搜刮了大量的「股金」。一九二一年五月九日，離廣州「三二九」起義只有二十天，清政府悍然下令將各省已准交商辦的鐵路幹線一律收歸「國有」，企圖用這一手段把全國鐵路主權一股腦兒拍賣給帝國主義。這嚴重損害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地方士紳的利益。這一政策一宣佈，就遭到湖南、湖北、廣東和四川等省人民的堅決反對。資產階級立憲派，利用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要求，發起了保路運動，向清朝政府叩頭請願，乞求「收回成命」。

粵漢、川漢這兩條鐵路直接涉及的有湖北、湖南、四川、廣東四省。它在廣東境內的路程較短，因此，兩湖和四川的反應更為強烈。後來，四川保路運動的規模和激烈程度又大大超過兩湖地區，這有幾個原因：第一，當時各省鐵路公司的集股中，四川的實收股額占第一

位，是湖南的兩倍半、湖北的近八倍。清政府將鐵路收歸國有後，又要將各省鐵路公司已收的股金強行奪去。它在經濟上給四川人民的打擊遠比其他任何一省更大。第二，從鐵路股金的來源看，川漢鐵路主要是靠「租股」，也就是在該年實收的租米中抽取百分之三，而且是強制性的。此外，如鹽商、茶商等則由鹽茶道勸導「認購」，其實也是攤派性的。因此，全省社會階層幾乎都同鐵路有經濟上的聯繫。「七千萬人皆在股東之數，此種缺望之舉，萬心齊決，必至不可收拾，非少數人所能解譬」。²這就使四川保路運動有著特別廣泛的群眾基礎。第三，在宣佈鐵路收歸國有後，最初堅持原商辦鐵路公司已收的股本一律不再發還，不久對廣東允許發還，對湖南允許酌還，四川和湖北卻不允發還，而湖北所收鐵路股金額只及四川的八分之一，這就使四川民眾更加感到不公和憤懣。此外，還有熊克武等多年努力，同盟會和遍佈全省各縣的哥老會（俗稱「袍哥」）不少首領間早已建立聯繫。保路運動興起後，會黨分子大批參加保路同志會。同志軍起義時，它的成員大多是會黨分子，更加使清朝地方當局深感棘手。

與此同時，各省的廣大人民突破請願運動的形式，紛紛罷工、罷市、罷課和遊行，掀起了激烈的反抗鬥爭。這次人民保路風潮以四川最為激烈。六月間，成都等地各階層人民組織保路同志會，提出了「打倒賣國賊」，「打倒賣國機關」的口號。八月，成都舉行數萬人的保路大會，散發傳單，號召罷市、罷課、停納捐稅以示抗議，各地人民聞風紛紛響應。九月七

2 秦耕：《蜀辛》，《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三百六十九頁。

日，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把保路同志會代表羅綸、蒲殿俊、顏楷、張瀾、彭芬等人騙進督署，加以逮捕。這一無恥行為，立即激起了全城廣大人民的憤怒。成都成千上萬人民自發地前往督署抗議，要求釋放各代表。號稱



一九一一年九月七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保路同志會會長蒲殿俊。當日，成都人民紛紛湧向總督府要求放人，趙爾豐下令開槍，造成「成都血案」。圖為保路同志會會長蒲殿俊。

「屠夫」的趙爾豐竟下令軍警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死難者有姓名可查的二十六人，受傷的人數就難以統計了。從城郊趕來支援的農民也有數十人被殺。整個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但是，在趙爾豐的瘋狂鎮壓下，人民並沒有屈服，鬥爭反而擴大了。本來，四川人民的憤怒已經日趨白熱化，這樣的大血案一發生，人們的憤怒再也無法抑制，革命黨又乘此鼓動，促使整個四川都沸騰起來，各縣人民紛紛舉行武裝行動，形成了波瀾壯闊的全省規模的起義，猛烈衝擊清朝政府在四川的統治。同時，國內各地群眾反對清朝政府的鬥爭也不斷高漲，一九一〇到一九一一年間，人民抗捐抗稅和其他鬥爭就有二百多起，鬥爭的規模更大，範圍更廣，中國人民和清朝政府的矛盾空前激化，「山雨欲來風滿樓」，革命有一觸即發之勢。

成都血案發生後，同盟會會員龍鳴劍、朱國琛、曹篤等立刻抓緊時機到城南農事試驗場裁成木板數百片，上寫「趙爾豐先捕蒲、羅諸公，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³二十一字。「然後將木板塗以桐油，包上油紙，投入河中。這就是人們所樂道的「水電報」。這些「水電報」順著河流向四面八方漂去，下游的人知道了成都發難的消息，紛紛揭竿而起。⁴而清軍巡防營出城，肆行槍殺，蹂躪不堪，更迫使城外數十里各處紛紛起來自衛。

成都血案發生的第二天起，來自成都附近各縣同志軍開始包圍成都。先是成都城南的華陽秦載賡等部，於九月八日早晨就開抵成都東門外。與此同時，成都西南的新津侯寶齋等部，在九月八日挺進成都南郊，和清軍激戰於紅牌樓。接著，成都西北的郫縣張達三等部也隨著開抵成都西門外。此外，成都東北的廣漢侯桔園（留日學生，同盟會會員）、綿竹的侯國治（哥老會首領，曾參加羅泉井會議）等起義後，切斷了成都經劍閣、廣元同陝西相聯結的交通線。從而形成了對成都的四面包圍，迅速發展到很大的規模。

九月二十五日，從日本歸國的同盟會會員吳永珊（玉章）和王天傑在榮縣宣佈獨立，建立第一個縣級的革命政權，成為成都東南農民軍的中心，這件事比武昌起義還早半個月。

四川保路運動的發生，可以說是全國性危機的產物，人們對清政府的憤慨已經到了極點，整個局勢一觸即發。有人在九月十六日給盛宣懷的私信中說：「蓋近年人心思亂，多因他政

3 熊克武等：《蜀黨史稿》，《辛亥革命史叢刊》第二輯，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百六十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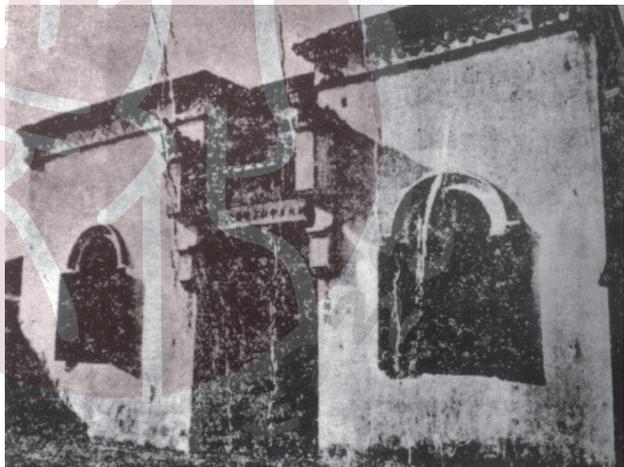
4 吳玉章：《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的回憶》，《吳玉章回憶錄》，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版，第六十六—六十七頁。

所召，不過借路發端。彼亂民志固不在爭路，而爭路諸人當奮爭時，初亦不料烏合之眾遂至於不可收拾也。」

離開這個大背景，單就四川保路運動本身來考察，很難說清楚它為什麼會這樣發展並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而這次運動反過來又對全國的革命形勢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最能強烈地扣動人們心弦的是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問題。保護鐵路權益，是全國人民矚目的異常敏感的問題。清政府偏要在這個問題上一味倒行逆施，把人們逼到別無他路可走的絕境。

四川是西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四川保路運動發展到大規模武裝起義的地步，對全國的震動是巨大的。它成了一個突破口，使國內本已十分緊張的政治空氣陡然更加緊張起來，直接成為武昌起義的導火線。

湖北的武漢，素有「九省通衢」之稱，交通便捷，是資本主義工商業和近代新式教育比



保路風潮與清軍空虛，正是發動起義的大好時機。頗有革命基礎的湖北兩個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加緊行動，秘密決定在中秋節（十月六日）舉行起義，推舉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孫武為參謀長，劉公為民政總理。圖為兩團體策劃武昌起義的地點——武昌雄楚樓。

較發達的地區。人們無論是對時局的瞭解，還是對新思想的接受，都能得風氣之先。湖北的新軍有第八鎮和第二十一混成協，由於原湖廣總督張之洞對它的重視，成了南方各省新軍中最精銳的一支。

這些新軍是以西法操練的，其成員的文化程度比較高，家境比較貧窮，軍隊中的生活又很艱苦，容易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此外，在起義前夕，由於長江中游連年水災和鐵路收歸國有的刺激，湖北社會本已處在極度的動盪不穩之中。更為重要的是，在主觀方面，湖北革命黨人多年來在新軍中的工作做得比較切實而深入。他們進行了長期艱苦的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掌握軍隊，積蓄力量，做好起義的準備。

湖北革命黨人的活動在二十世紀初年便已開始，最初出現的是一些革命小團體，如科學補習所、群學社、日知會等。這些組織雖然屢遭破壞，但革命志士們仍前仆後繼，奮進不已。以後又先後成立軍隊同盟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等二十多個革命組織。到武昌起義前夜，逐漸會合成文學社和共進會（它們的主要領導人幾乎全是同盟會會員）兩大革命團體。

文學社和共進會的革命目標是一致的，又都在新軍中秘密地發展革命力量，宣傳革命道理和進行組織活動，工作都做得很深入，新軍受到革命宣傳的影響很大，不少人傾向革命。他們一個一個地奪取了陣地，在一萬六千多人的湖北新軍中，約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和一些下級軍官加入了這個革命組織。武昌起義前夜，文學社和共進會的會員就達到五千多人，加上同情者已處於優勢的地位，從而為武昌起義奠定了扎實的基礎。軍隊中同革命為敵的不過一千

多人。這支反動當局用來鎮壓人民的武裝力量，終於悄悄地變成一支準備推翻反動統治的革命力量。當然，由於客觀和主觀方面的種種原因，士兵群眾中本來有著不同程度的潛在革命要求。但如果沒有革命黨人這樣艱苦長期的工作，如果不是採取了這切合實際的做法，也不可能出現湖北新軍普遍革命化的重大結果。

同年九月十四日，文學社和共進會實行了聯合，取消原來的各自組織和負責人名義，實行統一行動。之後，立刻派代表赴上海，請同盟會領導人黃興、宋教仁、譚人鳳來武漢主持起義活動。但他們三人一時都不能前來，而形勢的發展已難以等待。九月二十四日，雙方又集會，進一步籌畫武裝起義，並成立了領導起義的統一機構——軍事總指揮部，推選文學社領導人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專管軍事；共進會領導人孫武為軍政部長，專管軍事行政；劉公為總理，專管民政。又在漢口設立政治籌備處，草擬文告，制定旗幟，並負責將來建立革命軍政府的工作。

第二天，他們立即召開各部隊近一百人的代表大會。文學社和共進會的重要分子幾乎都參加了。會上，除通過軍政府的重要組織成員外，還討論了軍事行動計畫。劉復基根據武漢三鎮地形和敵我雙方力量配置，提出總動員計畫的方案，大家討論後通過。它的主要內容是：工程營首先發難，佔領楚望台軍械所；炮兵第八標從中和門入城，攻擊總督衙門；對其他部隊也規定了明確的行動目標和路線。

原定的起義日期是十月六日，也就是陰曆的中秋節。但正在召開各部隊代表大會的那天，

駐在南湖的炮隊因一件小事發生衝突，引起清方的驚恐，已嚴密戒備。起義日期只得改在十月九日晚上。那天中午，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機關配製炸藥時不慎燃燒起來。孫武燒成重傷，送入醫院。俄國員警聞聲趕來，在室內搜得大批革命檔、炸藥等，還捕獲劉公的弟弟劉同。蔣翊武得到消息後，感到情況緊急，立即在下午五時發出命令：在當晚十二時舉義；各軍聽到南湖炮聲後，按規定目標發起進攻。命令中規定的各部隊行動目標和劉復基在九月二十五日宣佈的計畫大體相同。可是不幸的事情相繼發生：負責通知炮隊的鄧玉麟沒有將命令及時送到，南湖炮隊在午夜十二時沒有發炮為號，其他各部隊無法行動起來；劉同被捕後，又將小朝街軍事總指揮部地點供出，清政府在武漢三鎮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劉復基、彭楚藩等三十三人被捕。蔣翊武被迫在混亂中逃離武漢，孫武受傷住進醫院，其他領導骨幹或隱蔽或逃亡，武昌的起義活動頓時失去了總的指揮樞紐。

清政府在捕獲劉復基等後，連夜審訊。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三人都表現得十分英勇，坦然自稱是「革命黨」，並且痛斥審訊的清吏道：「好！只管殺，我只怕你們也有這一日呢！」他們在審訊法庭



一九一一年九月九日，清軍大肆搜捕革命黨人，蔣翊武被迫逃走，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等數十名革命黨人被捕遇害。圖為被捕遇害的革命烈士彭楚藩。

上，慷慨陳詞，堅貞不屈，怒斥清政府倒行逆施，禍國殃民。他們高呼「民國萬歲！」、「孫中山和未死同志萬歲！」口號，表現了革命黨人的凜然正氣。到十月十日清晨，三人相繼被害，始終沒有透露出一點起義的具體行動計畫。

十月十日那一天，武昌城內城外的空氣異常緊張。三烈士英勇就義的消息不脛而走。清政府軍警繼續進行搜捕。社會上還傳聞革命黨人名冊已被搜去，將要按名捕拿，使新軍內的革命黨人處於人人自危的狀態。如果再不堅決行動，無異坐以待斃。這天中午，工程第八營代表熊秉坤前往第二十九、第三十標等進行聯絡。其他各標、營的革命黨人都躍躍欲試，紛紛秘密從事準備。清政府的鎮壓和恐怖手段，激起了革命黨人的強烈反抗，就直接推動了這次起義的爆發。

二、武昌首義與各省回應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震撼中外的武昌起義（時為中國舊曆辛亥年，所以又叫「辛亥革命」）爆發。

武昌起義是以士兵為主體的湖北新軍的起義。平日被人輕視或忽視的小人物——新軍士兵們，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演出了這樣一場改變歷史面貌的威武雄壯的活劇。

擔當發難任務的是工程第八營。起義的時間定在晚上。

十月十日晚七時許，準備發難的緊張氣氛已經籠罩營內。後隊二排長陶啟勝聽到風聲，

去該排三棚巡查，看到革命黨人金兆龍正在手擦步槍，便厲聲喝問：「哼！你們要造反？」金兆龍毫不畏懼，大聲說：「造反就造反！」回答得十分乾脆。陶啟勝上前扭住金兆龍。其他士兵發槍向他射擊。代理工程八營管帶的督隊官阮榮發和右隊隊官黃坤榮聞聲趕來阻擋，被士兵擊斃。營內人聲嘈雜，官長紛紛逃避。隨後他們鳴笛集合四十餘人，把清政府發的肩章撕掉，臂纏白布，在熊秉坤、金兆龍的率領下，沖出營房。楚望台離工程營駐地只有一千多米，聲息相通。這時，左隊的馬榮、羅炳順等送來消息：楚望台黨人聽到工程營駐地的槍聲後立刻起來回應，軍械庫已經得手。於是，局面便急轉直下了。

熊秉坤率領一部分起義士兵進駐楚望台後，就在八時二十分以總代表兼大隊長的名義發佈命令，規定起義部隊稱湖北革命軍，以湖廣總督督署為最大作戰目標，分三路攻擊總督督署。這是「因為參加革命的同志都知道，若不攻克督署都要殺頭的，所以革命黨人那時候只想要勝利」。⁵並且一定要在天明前把總督衙門打下來。他們最初以工程營為主力，分兩路向



武昌起義十八星旗。

⁵ 朱峙山藏札·魯祖軫的信，《湖北文史資料》第四輯，第一百七十一頁。

督署進攻。但督署正面是一條狹窄的巷道，守軍以機槍掃射，起義軍進攻兵力難以展開，火力也不足，所以屢攻不克。

炮八標入城後，立刻分據城門和蛇山等陣地，向督署發炮轟擊。蔡濟民等又洽商乾記衣莊，將所存衣被用煤油澆灌後加以燃燒，頓時火光沖天，督署目標明顯，方便炮隊瞄準，威力大增，督署被

排炮轟成一片廢墟。湖廣總督瑞 等清朝官員倉皇逃往停泊江面的「楚豫」號軍艦，第八鎮統制張彪率輜重營殘部渡江退守。經過一夜激戰，武昌清政府勢力已基本被消滅，起義軍完全控制了局勢。第二天，「武昌已別成一世界。滿城兵士皆袖纏白巾，威風抖擻」。⁶

武昌起義的第二天，同武昌隔江相對的漢陽和漢口隨即光復。這裡的駐軍是新軍第四十二標的第一營和第二營。文學社在這個標內有很大的力量，並建有文學社陽夏支部。他們一行動，漢陽和漢口便很順利地光復了。漢陽有儲存著大量軍械和彈藥、對局勢舉足輕重的漢陽兵工廠。再過一天，又攻佔繁華的商業城市漢口。武漢三鎮連成一片。它們的相繼光復，進



武昌起義地圖。

6 胡石庵：《湖北革命聞見記》，《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第十五頁。

一步擴大了武昌首義的成果。在漢口還成立了軍政分府，由剛出獄的文學社重要成員詹大悲任主任。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如果單有武裝起義的勝利而沒有建立起牢牢掌握在革命黨人手中的革命政權，革命勝利了也是不鞏固的。湖北的革命黨人當時還沒有這樣的認識。他們的認識比較幼稚，認為所要推翻的只是那個清朝政府，只要把它推翻，凡是表示贊成民國的漢人似乎都是一家人了。於是，在他們看來，「舊日官僚、政客、進士、舉人都富有經驗學問，而自覺能力薄弱，資望不夠，盲目贊同。參加諮議局會議桌上的官僚，其聲價反比多年革命老同志為高」。⁷由於建立的是軍政府，他們認為：「中國人心理重視偶像，軍人尤其重視軍階地位，倘不以一有名望的人出來號召，則不易成功。」⁸正是利用革命黨人心理上的這種弱點，當第二天上午革命黨人到諮議局商議建立軍政機構時，一些諮議局議員和舊軍官就提出推舉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相當於旅長）黎元洪來當都督，並且得到多數人的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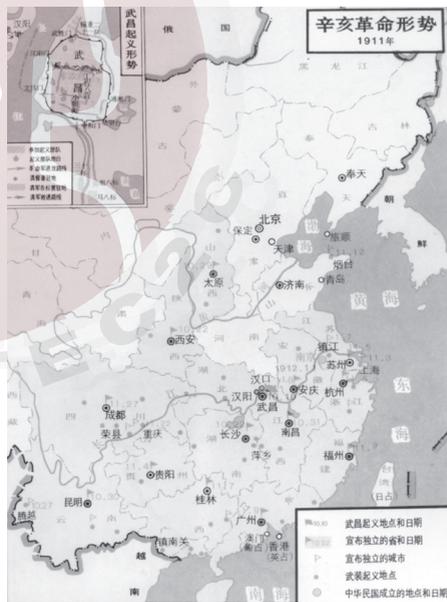
黎元洪在新軍高級軍官中被人們認為是比較開明的，對湖北保路運動曾表示同情，平時對士兵也比較寬厚，因而博得不少新軍士兵的好感。但他原來是堅決反對革命的。工程營發難後，曾派人到第二十一混成協聯絡。派去聯絡的人員被捕後，黎元洪親手把他殺害。直到炮八標入城後，向該協轟擊，內部士兵也準備發動，黎元洪才慌忙逃避到黃土坡的該協參謀

7 溫楚珩：《辛亥革命實踐記》，《辛亥首義回憶錄》第一輯，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版，第六十一頁。

8 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七十二頁。

劉文吉家中。但他派回家中搬運積蓄的伙夫被起義軍俘獲，起義軍就把他從劉家搜出，以後送到諮議局。儘管如此，黎元洪仍不願出任都督。當時在場的李翊東有一段生動的回憶：「是時，黎面色慘白，張惶失措，眾即言舉黎任都督，用都督黎名銜出示安民，要黎承認。黎畏縮舌顫曰：『莫害我，莫害我。』翊東見黎堅不肯認，

手柄長槍法之曰：『你做滿清這大的官，應該殺的。我們今天不殺你，反舉你做都督，你還不幹。你這生成的奴性，還想戴滿清的紅頂子，我把你殺了，再來舉人。』黎益瑟縮不語，在場者均色變，群起阻止。哄聲言曰：『不要放槍。』翊東乃又曰：『不管他承認不承認，把告示用都督黎的名銜張貼出去就是了。』於是將告示貼出。置黎於樓上一室內，以執戈者守之。此乃當年之真相，回憶及之，猶如昨日。」⁹佈告上的「黎」字還是李翊東代他簽上的。佈告貼出後，產生的影響很大。一些人看後驚慌地說：「想不到黎協統也是革命黨。」¹⁰這在當時也起了一些安定人心的作用。同時，



辛亥革命形勢。

9 李翊東：《書吳醒漢〈武昌起義三日記後〉》，《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史料輯錄》，第八十一—八十二頁。

10 胡贊：《辛亥史話》，《辛亥首義回憶錄》第一輯，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版，第二百零一十一頁。

革命黨人還採取許多措施來提高黎元洪的聲望和地位。隨著革命形勢在全國的迅速發展，黎元洪的態度也有了變化，對充當湖北軍政府都督越來越起勁了。

後來，黎元洪利用職權，大幹壞事。他利用擴軍的機會，大量起用舊軍官，逐步排擠革命黨人，又挑撥和擴大革命黨人的內部矛盾，用共進會打擊文學社，用孫武逐走蔣翊武、刺殺張廷輔，又利用共進會內部的黃申彝逐走孫武，把湖北軍政府的權力逐步集中到他自己手裡，武昌起義在湖北取得的成果終於被斷送掉了。這是十分慘痛的教訓。

「革命黨舉義成功」的捷報，立即飛傳中國大地，震撼了大江南北。十月十三日，上海的《民立報》上發表于右任所寫的短論說：「秋風起兮馬肥，兵刃接兮血飛，蜀鵲啼血兮鬼哭神愁，黃鶴樓頭兮忽豎革命旗！」；「嗚呼，蜀江潮接漢江潮，波浪彌天矣。吾昨日登吳淞江口而俯視長流滾滾者皆血水也。此三日間，天地為之變色矣。噫！革命黨者，萬惡政府下之產兒，故有倒行逆施之政府，欲求天下不亂而不得。」次日該報的第一版上又刊出「黎元洪小照」和「黎元洪小史」。武昌頓時成為全國萬眾矚目的革命中心。

隨之，散佈在各地的革命黨人以及和同盟會有聯繫的革命小團體，接著便乘勝在各省領導或積極發動新軍、會黨起義，促使革命形勢在全國範圍內飛速發展。在十月十日之後，僅九天之內，先後宣告獨立的就有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五省，簡直使人目不暇接。在十月間宣佈獨立的六個省中，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連成一塊，山西、陝西兩省也連成一塊。如果加上同志軍聲勢日盛的四川，七個省便彼此連接，在南方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湖北首義不再是孤立的。其他各省聞風後也正躍躍欲試。清政府已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接著，革命的浪潮就向華東和華南迅猛擴展了。

到十一月下旬，僅一個多月，全國二十四個省區中已有十四個省先後宣佈獨立、光復，脫離了清王朝的統治，其他各省區的反清鬥爭也在激烈地進行。革命浪潮以不可遏制的強大威力將清王朝的反動統治頓時沖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面。

辛亥革命，這次以士兵為主體的湖北新軍的起義，成為了在短時間內席卷全國的革命大風暴。這場大風暴，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使反動統治秩序再也無法穩定下來，從而對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面貌，開闢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新紀元。諺云：「事過百年而後定。」在辛亥革命已過百年之際，我們應當實事求是地追念辛亥革命及其領導人孫中山的偉績和功業，予以公允的評價。

三、辛亥革命的世界意義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一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革命運動，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個偉大事件，是中國政治現代化——民主政治的源頭。它在中華民族振興的進程中，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這場革命，不但推翻了帝國主義的走狗清朝政府，埋葬了在中國綿延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實現了中國國家體制的一次重大變革，破天荒地建立了一個民主共和國；同時，也

大大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民主主義覺悟，促進了民主精神的高漲，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雖然由於時代條件的限制和資產階級的軟弱，它沒有完成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任務，又是一次不徹底的革命，但它的勝利和失敗，給此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提供了經驗教訓，開闢了前進的道路。

辛亥革命是標誌中國歷史發展轉折的一座里程碑，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一個新開端。

列寧對辛亥革命和孫中山曾給予很高的評價。他將孫中山和西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作了鮮明的對比，將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和被壓迫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嚴格區分開來，確切地指出了二十世紀初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進步作用。他說：「人們自然可以把亞洲這個野蠻的、死氣沉沉的中國的臨時大總統與歐美各先進文明國家的總統比較一下。那裡的共和國總統都是資產階級的奴僕、走狗或傀儡，那裡的資產階級已經腐朽透頂，從頭到腳都沾滿了髒汙和鮮血——不是皇帝們的鮮血，而是為了進步和文明在罷工中被槍殺的工人的鮮血。那裡的總統是資產階級的代表，那裡的資產階級則早已拋棄了青年時代的一切理想，已經徹頭徹尾娼妓化了，已經完全把自己賣給百萬富翁、億萬富翁和資產階級化了的封建主等等的。這裡的亞洲的共和國臨時大總統是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這種精神和氣概是這樣一個階級所固有的：這個階級不是在衰弱下去，而是在向上發展；它不是懼怕未來，而是相信未來，奮不顧身地為未來而鬥爭；它憎恨過去，善於拋棄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東西，決不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而硬要保存和恢復過去的東西。」他高度

讚揚孫中山是「不愧為法國十八世紀末葉的偉大宣傳家和偉大活動家的同志」。¹¹

一九一一年爆發的辛亥革命，距今已過百年。回眸返思，這場革命不僅是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捩點，它推倒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開闢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新紀元，而且它「給亞洲帶來解放，使歐洲資產階級的統治遭到破壞」¹²，是在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佔有重要地位的歷史事件，即對世界的歷史也有其獨特地位和偉大貢獻。

首先，辛亥革命是中國和亞洲歷史上一場真正的革命。

在中國和亞洲歷史上，真正以革命手段變革社會制度和社會生產方式的偉大門爭，是從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開始的。在辛亥革命以前，任何其他階級以及其革命鬥爭，都不具備社會制度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根本變革的革命意義，只是從辛亥革命開始才出現嚴格意義的兩大社會經濟——資本主義經濟與封建地主經濟，兩大社會制度——民主共和制度與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生死大搏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結束了延續兩千一百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飛躍，立下了前所未有的豐功偉績，奠定了偉大的歷史豐碑。

辛亥革命有別於此前中國歷史上的其他革命運動，它以全新的姿態開始了改天換地的鬥爭。這首先表現於這場革命是由先進階級所領導的，當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社會

11 《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四百二十四—四百二十五頁。

12 《新生的中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三百九十五頁。

生產方式的政治代表和獨立的政治領導力量登上歷史舞臺，成為全國各革命勢力的領導中心，決定著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沒有過的大變化。其次，同盟會作為一個新型的、統一的、全國性的政黨而出現，掌握了革命的領導權。政黨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反映，同盟會代表著人民大眾要求擴大國內統一市場、建立共和國的最高利益，成為革命的領導核心，這與狹隘的封建行幫組織和農民的會黨組織有著明顯的區別。再次，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作為一個比較明確、比較完整的民主革命綱領而出現。它不僅要求徹底推翻清王朝，而且要在這個基礎上建立全新的、議會制的民主共和國，發展資本主義大工業，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為獨立自由的新中國。這是歷史的巨大進步。

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經出現過諸如太平天國、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等頗有影響的革命鬥爭和革新運動，但就其歷史地位來講，都難以與辛亥革命相提並論。

由農民階級領導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堅持鬥爭十四年，縱橫十八省，光復六百多個城市，控制了大半個中國。它還建立了農民的革命政權——太平天國，頒佈過《天朝田畝制度》，主張「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匀，無人不飽暖」；抗擊了外國資本主義強盜與本國封建主義的反動聯盟，有力地衝擊了半殖民地封建的統治秩序，取得了中國舊式農民戰爭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太平天國所取得的豐功偉績，在世界農民運動史上也有很高的歷史地位。可是，太平天國運動畢竟是一次單純的、缺乏先進階級領導的舊式農民戰爭，處於小生產地位元的農民階級，無從認識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無從提出科學的革命理論，

無從制定以先進的社會制度取代落後反動的社會制度的革命綱領，因此，也就無從反映時代的需要，無法將革命引向真正的勝利。其最後的歸宿，或則黃袍加身，自成帝王；或則為他人利用，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革命終歸以失敗而告終。

由資產階級維新派領導的、具有比較明顯的近代鬥爭格局的戊戌變法運動，為了挽救民族危機、謀求國家獨立和資本主義的發展，維新志士們努力學習西方，傳播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政治學說，仿效日本、德國、英國的君主立憲模式，努力改造中國，反映了在中國剛剛出現的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和新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和願望，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進步意義。但是，不成熟的經濟形態和不成熟的階級力量，決定了這場革新運動只能在封建統治階級所允許的狹小範圍內進行，資產階級（這裡主要是指由地主、商人轉化而來的資產階級上層）渴望分享政權，卻又想繼續維持皇統；要求發展資本主義，又不敢觸動封建土地所有制；亟呼救亡圖存，又不敢公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企求社會各階級的支援，卻又與農民階級和其他革命勢力處於對立地位。總之，只求有限的改良，而反對任何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革命。結果，地主階級頑固派稍一反擊，戊戌六君子就被送上了斷頭臺，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領袖被迫出逃，百日維新終歸曇花一現而徹底失敗。

義和團運動是一次以農民為主體的反帝愛國鬥爭，英勇抗擊了包括英、法、德、日、俄、美、意、奧在內的八國聯軍的侵略，沉重打擊了殖民主義者瓜分中國的狂妄野心，充分表現出中國人民不可侮的反抗精神，為中華民族獲得解放奠定了一塊重要基石。但是，義和團運

動在反對外來侵略的同時，排斥一切西方文明和科學技術，盲目地打出「扶清滅洋」的旗幟而被封建統治者所利用。這種近似愚昧而有違歷史發展的做法，終於招致徹底的失敗。

從上述比較中可以看出，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的近代中國，只有辛亥革命才是一場真正的社會、政治和思想大革命。辛亥革命敢於把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拉下馬，把反動的封建帝制掃進歷史垃圾堆，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革命壯舉。中國人民為了打倒皇帝鬥爭了兩千多年，只是到了孫中山和革命黨人手上才得以實現，這是十分了不起的歷史功業。辛亥革命所開創的民主共和道路，為時代發展所必需，任何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帝制小丑，都將被歷史車輪碾得粉碎。辛亥革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發展的最高峰，它將彪炳千秋，永垂史冊，而享有崇高的歷史地位。值得指出的是，辛亥革命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慘遭所有殖民帝國蹂躪的國度裡爆發，它不僅摧毀了中國的封建帝制，同時衝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秩序，敲響了帝國主義奴役被壓迫民族的喪鐘。因此，辛亥革命的槍聲，不僅震驚了受帝國主義奴役的大眾，也震動了寰球十六萬萬的全人類。辛亥革命是繼英、法資產階級革命之後，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歷史事件。

其次，辛亥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民主革命的偉大先導。如同孫中山是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一樣，辛亥革命也是中國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民主革命的偉大先導。這種先導作用全面體現於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方面，它的成功與失敗的歷史經驗和教訓，至今仍然激勵和鞭策著中國人民和經濟欠發達地區人民前進，並為後人的革命鬥爭提供歷史

借鑒，成為人類的寶貴遺產。

在政治方面，辛亥革命創造了不少成功的經驗，諸如通過政黨來組織階級隊伍，建立革命的領導核心；創造階級的主義（革命理論）和制定革命綱領，以明確革命方向和指導革命鬥爭；引進西方革命學說，大造革命輿論，以宣傳新制度的優越性，批判舊制度的落後性；堅持暴力鬥爭，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等等。辛亥革命以後，孫中山組織了資產階級內閣，建立了國會——臨時參議院，頒佈了《臨時約法》，創立了中華民國，開創了民主共和的政治新局面。所有這些，不但保證了革命的順利發展，而且給中國人民和世界被壓迫民族以巨大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和「第三世界」革命黨人的革命本領很多都是從孫中山那兒學來的。辛亥革命所開闢的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革命方向，順應歷史潮流，合乎人民需要，始終激勵著中國人民和世界勞苦大眾。凡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者，都十分尊重辛亥革命的開創作用，並將沿著孫中山所開闢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努力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孫中山所夢寐以求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局面，必將在全世界逐步實現。

在經濟方面，辛亥革命開創了中國近代化的第一次騰飛，把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引向近代工業化的發展道路。大家都熟知，革命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解放生產力，發展社會生產，以滿足廣大人民更高層次的生活需要。孫中山發展社會經濟的偉大抱負及其所做的不懈努力，將愈來愈受到後人的尊重，並愈來愈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早在十九世紀末興中會成立時，孫中山就響亮地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指出「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以申民志，而扶國宗」。「興中會」取名亦寓意於此。同盟會綱領進一步提出民生主義，充分認識到解決土地問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把經濟建設與變革國體擺到同樣重要的地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頒佈了一系列獎勵工商業發展的規章制度，鼓勵人民興辦實業，從事農墾；獎勵華僑回國投資；要求各省成立實業公司，鼓勵民間成立實業團體。在革命政府的獎勵、推動下，一個興辦近代工業的熱潮迅速在全國範圍內興起。

孫中山懷抱對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以「拯斯民於水火」為己任，把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列為改革民生的首要課題。為此目的，孫中山進而提出「耕者有其田」、「節制資本」的口號，並為造就「十萬人以上之大資本家」和「數十個上海」大工業城市，實現工業近代化和成為世界「第一大國」而做出不懈的努力。在孫中山親自制定的《實業計畫》藍圖中，其規模之宏大，計畫之周詳，實在令人欽佩。它以發展交通為重點，提出建造中央、東南、西北、西南、東北、高原六大鐵路幹線，包括近百條鐵路線，總計長十萬英里；同時修建公路一百萬英里，疏通現有運河兩條，新開運河兩條；在中國中部、北部、南部新建三大港口。計畫通過這些交通線，把沿海港口和內地重鎮、工業區和農業區、原料產地和工業城市、邊疆和內陸統統聯結起來，使中國成為一個交通發達、經濟繁榮的強大國家。此外，還具體規劃實現農業近代化，廣泛採用農業機械和先進農業生產技術；發展近代採礦業、鋼鐵業、機

器製造業和各種輕工業。孫中山所制定的《實業計畫》，是改造中國小農經濟、實現中國工業化的偉大藍圖，是「振興中華」之希望。

為了實現這一計畫，孫中山銳意改革，在堅持獨立自主、不失主權、不用抵押的原則下，主張對外實行「開放主義」，利用外國資本、人才和方法，輸進外國機器的科學技術，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即發展中國機器大工業，「突駕」歐美日本。孫中山的偉大構想和抱負，儘管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和主觀上存在不少不切實際之處，最終未實現，但他那種為了擺脫帝國主義奴役而亟求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熾熱的愛國情懷，那種為廣大人民生計而勇於開拓的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以及為振興祖國而大膽進行經濟改革所開創的工業近代化的建設道路，無不反映了人民的願望和民族的需要，深深地影響著當時和後世，具有不可估量的生命力。事實證明，孫中山所確立的「扶助農工」，發展經濟的道路，是世界被壓迫民族求得解放的必由之路。

在文化思想和社會風尚方面，辛亥革命開創了一代新風，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新思想，開始吹拂古老的中國大地。近代新文化衝破「忠君盡道」的封建專制文化的桎梏，人們開始用新的道德觀念和新的價值觀念思考問題和認識社會，封建道德日益為人們所遺棄。南京臨時政府三令五申，宣佈政府官員都是「人民公僕」，革除等級森嚴的「大人」、「老爺」稱謂，改以「先生」、「同志」相稱。通令剪除髮辮，廢除跪拜禮而改以握手和敬禮……處處體現出自由、平等、民主的精神，反映了新時代的精神風貌。

總之，辛亥革命所開啟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近代化的鬥爭，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壯舉，同時也是世界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斷進步的重要表現。

第三，辛亥革命是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典範。

孫中山是真誠的愛國者，同時也是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偉大旗手和世界被壓迫民族的精神領袖。從他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把中國革命與亞洲乃至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早在一八九七年，當孫中山首次與日本志士宮崎寅藏暢談革命旨趣時，即「顯示出深山虎嘯的氣概」，贏得宮崎的景仰。孫中山表示，他之所以興起革命，既是為了「拯救中國四億的蒼生」，更是為了「雪除東亞黃種人的恥辱，恢復和維護世界的和平和人造」，是為中國、為亞洲、為全人類的解放而抗爭。宮崎大為折服，認為孫中山的革命主義，已「接近真純的境地」。孫中山是無與倫比的「東洋的珍寶」。¹³以後，孫中山進而提出「亞洲門羅主義」的口號和「大亞洲主義」的主張，呼號亞洲人民團結起來，為民族的獨立解放共同鬥爭。為此目的，孫中山奔走於亞洲各地，與日本、菲律賓、越南、朝鮮、印度、馬來亞、緬甸、泰國的革命志士建立普遍的聯繫，宣傳革命主張，組建各種反殖民主義的聯合團體，支援各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所有這些，在亞洲各國產生了極其廣泛和深遠的影響，贏得了亞洲人民的尊重和崇仰，公認他是「東方被壓迫革命民眾的首領」、「東方民族解放之父」和「世界

13 參見〔日〕宮崎寅藏著、林啟彥改譯：《三十三年之夢》，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五年版。

被壓迫民族、世界被壓迫階級的救主」。

孫中山還深深知道，中國革命的成功，是東方被壓迫民族解放的關鍵。為此，他屢敗屢起，致力革命，為亞洲人民做出榜樣。辛亥革命的勝利，不僅標誌著中國歷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到來，也標誌著亞洲和世界歷史上結束殖民統治、獲得民族獨立的新曙光的出現。誠如孫中山在一九〇四年《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所預言：「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用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活動而敞開。」孫中山的期望，現在已在亞洲和世界上開花結果而日益成為現實了。

我們還應看到，辛亥革命本身在近代亞洲民族解放運動中所具有的崇高歷史地位。從一九〇五年開始，亞洲各國先後掀起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族解放運動，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一九〇五—一九一一年間的波斯革命、一九〇五—一九〇八年的印度反英鬥爭、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土耳其革命、一九〇八—一九一三年的印尼革命民主運動等，所有這些鬥爭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抗外來侵略、要求民主改革的民族民主運動的性質。但是，只要稍加比較就不難看出，這些鬥爭無論從革命的發展程度或它所取得的成就來看，都無法與辛亥革命相比擬。

我們說辛亥革命是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發展的最高峰，例如在政治綱領上，別的國家只一般地提出反對封建專制的口號，而同盟會所揭示的三民主義則要激進得多，具有較高的民主

性，又直接與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相聯繫。再如在革命政黨的建設上，亞洲各國大多未建立嚴格意義的資產階級統一政黨，而同盟會則要成熟得多，同時湧現了像孫中山、黃興等具有很高威望的革命領袖人物。在鬥爭手段和規模上，亞洲各國大多採取和平請願方式，而中國同盟會則發動了十次武裝大起義，形成了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並最終以革命手段推翻了清王朝。在革命成果方面，亞洲個別國家雖然早於十九世紀末就建立過資產階級共和國和頒佈過憲法，但它很快遭到鎮壓而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革命領導人亦隨之屈服，革命成果煙消雲散。而更多國家的民族解放鬥爭，則處於以爭取社會改良、實行君主立憲的低級發展階段。在亞洲，唯有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進入了革命的高層次，取得了結束封建帝制、建立中華民國、頒佈《臨時約法》的重大勝利，從而具有劃時代的世界性意義。對此，列寧高度評價說：「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具有世界意義，因為它將給亞洲帶來解放，使歐洲資產階級的統治遭到破壞。」在二十世紀初葉，以辛亥革命為代表的亞洲覺醒，以及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蓬勃開展，標誌著世界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毋庸諱言，辛亥革命最終還是失敗了，革命的成果全部被中外反動派所破壞，中國的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並沒有出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沒有完成，中華民國只不過是一塊空招牌。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諸如中外反動派的力量過於強大，資產階級力量過於軟弱，加之革命黨本身不夠堅強有力，主義不夠完善等等。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幾經努力，領導和發動「二次革命」、開展護國、護法鬥爭，但由於對工農發動不夠，流於單純的軍事冒險，結

果屢遭挫折，直到最後轉而尋求工農的支持，實行聯俄、容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才出現新的轉機。不幸的是，由於孫中山的過早病逝，中國的革命大業，未能由他親手實現，因此而抱終天之恨。所幸孫中山的後繼者，十分尊重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開創和先導作用，秉承「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志，將革命進行到底，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一個又一個的重大勝利。

我們是歷史主義者，承認歷史的客觀存在。中國近代史有如一根鏈條，鏈鏈相聯結，鏈鏈相互影響和推動著，不斷把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任務向前推進。而辛亥革命則是這一歷史鏈條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起著承前啟後的巨大作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與失敗，中國社會不會發生以後的根本性的變化，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中國，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的國際地位。